

博雅人文读本

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

The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Reader

刘永华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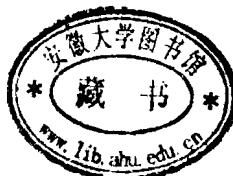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雅人文读本

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

The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Reader

刘永华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刘永华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
(博雅人文读本)

ISBN 978-7-301-18633-6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文化史—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K2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5820 号

书 名: 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

著作责任者: 刘永华 主编

责任编辑: 岳秀坤

封面设计: 高海云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633-6/K · 076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 yahoo. com. 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刷者: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销商: 新华书店

787mm × 1092mm 16 开本 33.25 印张 615 千字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 pup. pku. edu. cn

目 录

第一编 国家认同

造像记所见民众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 侯旭东(3)

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

——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 科大卫 刘志伟(25)

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

——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 程美宝(42)

第二编 信仰·世界观·地域社会

财富的法术

——江南社会史上的五通神 万志英(65)

明清江南城隍考

——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农民信仰 滨岛敦俊(108)

神明的标准化

——华南沿海天后的推广,960—1960年 华 琛(122)

帝制中国晚期的标准化和正确行动之说辞

——从华琛理论看福州地区的仪式与崇拜 宋怡明(150)

第三编 仪式·政治·社会

元会的建构

——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 渡边信一郎(173)

莆田平原的宗族与宗教

——福建兴化府历代碑铭解析 郑振满(211)

福建社神之转型	丁荷生(234)
元代墓祠祭祖问题初探	常建华(274)
明清徽州的祭祀礼仪与社会生活	王振忠(281)

第四编 历史记忆

女性形象的重塑

——“姑嫂坟”及其传说	刘志伟(307)
-------------	----------

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	赵世瑜(323)
---------------	----------

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

——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	陈春声(349)
------------------------	----------

开山宿老与英雄

——历史记忆与香港的移民、定居与纠纷的传说	蔡志祥(377)
-----------------------	----------

瓦寺土司的祖源

——一个对历史、神话与乡野传说的边缘研究	王明珂(398)
----------------------	----------

第五编 感知·交流·空间·习俗

风尘、街壤与气味

——明清北京的生活环境与士人的帝都印象	邱仲麟(431)
---------------------	----------

崇祯十七年的江南社会与关于北京的信息

	岸本美绪(465)
--	-----------

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

——以成都为例	王笛(478)
---------	---------

妇女何在?

——抗婚和华南地域文化的再思考	萧凤霞(496)
-----------------	----------

延伸阅读

(518)

编后记

(527)

第一编

国家认同

认同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社会史与政治史、地方史与大历史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对族群/民族、文化、政治建构的研究，都涉及认同的问题。在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对国家认同的研究，尤其受到学界的关注。本编选入的三篇论文，尽管处理的是不同的主题和时代，但都涉及国家认同问题。

侯旭东

造像记所见民众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

这篇论文在细致解读 1700 多种北朝造像记的基础上，探讨了北朝民众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问题，进而对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体”理论提出了批评。从这些造像记不难看出，民众并非生活于“天高皇帝远”的世外桃源，相反，为皇帝和国家祈福的现象，一度在造像记中相当普遍（占三四成），显示出民众对朝廷的高度关注。因此，作者认为，谷川对中古社会的理解，可能在过分夸大了豪族的角色的同时，低估了朝廷的影响。造像记还反映了民众对国家的认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皇帝而州郡令长而自身及家人亲戚的自上而下的阶序（hierarchical）意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官方意识形态对民众世界观的影响，很值得我们注意。

侯旭东，1968 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古社会文化史，著有《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1998）、《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2005），翻译《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和生活》（1999）、《东汉生死观》（2005）等。

中国历史上的基层社会,近来日益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1]研究这一领域不仅能使今人触知往日芸芸众生的生活,也有助于动态、立体地把握中国历史,对于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朝廷与百姓生活的关系亦具重要意义。

具体到北朝时期,最先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是日本学者,关注点为村落,宫川尚志的研究是其代表^[2];1970年代以来,在谷川道雄先生倡导下,对整个中世纪的地域社会多方探讨,并提炼出“豪族共同体”、“府兵制国家论”等理论。^[3]最近,郝春文、刘淑芬分别对北朝佛教结社、民间佛教活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齐涛也对这一时期乡村社会做了考察。^[4]相关成果不少,但仍有一些问题需加以探究。

谷川先生的理论推进了对六朝时代的认识,让我们不但能从朝廷,亦从地方及双方互动的角度去把握这一时代,厥功甚伟。不过,他的研究与其说是在探讨地域社会,不如说是通过地域社会来理解豪族(贵族),并由此解释六朝历史。他分析地域社会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均在豪族,强调豪族在地方所起的关键性的支配作用及对国家形成的影响。^[5]对豪族的重视使他忽视了朝廷及其他力量在地方的作用与影响,其结论因而也难免存在问题。且“豪族共同体”在多大程度

[1] 这方面的研究有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谷川道雄主编:《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玄文社,1989年;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丛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朱德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等等。

[2] 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

[3] 谷川道雄:《中国的中世》、《中国社会构造的特质与士大夫的问题》,《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府兵制国家论》,蒋非非译,《北大史学》第2辑,1994年。

[4] 郝春文:《东晋南北朝佛社首领考略》,《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东晋南北朝的佛教结社》,《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刘淑芬:《五至六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史语所集刊》63本3分;齐涛上引书。

[5] 谷川道雄:《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16—18页;《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基层社会与历史性——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1992年,623—626页;《六朝时代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从山东贵族的居住地问题入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13—16页。

上揭示出这一时期地域社会的特点也需要认真研究。进言之,谷川先生研究所依据的基本上是传世文献,特别是正史,这些资料中叙述活跃于各地的豪族之处颇多,对乡村生活其他方面少有涉及,得出上述结论也就很自然了。要深入其中,切近审视这一时期的地域社会的情况,则需另寻更为直接的材料。这里试图利用北朝造像记,分析其中为皇帝、国家祈愿的内容,来了解当时百姓(主要为村落居民)^[6]对皇帝、国家的态度与认识。这类祈愿从观念的角度证明了朝廷对基层民众的作用与影响,有助于揭示民众与朝廷的关系并恰当估价豪族的作用。

造像记是民众造像活动的产物。北朝间佛教弥漫北土,民众或以个人名义,或以家庭、寺院为单位,或聚集若干信众组成邑义、法义来造像兴福。他们出资雇匠雕造或购买制成之佛像。佛像小者盈寸,大者丈余,置于室内,或街衢、村边、寺院内外,亦有就山崖雕刻如云冈、龙门者。佛像雕讫、购入后,出资者多刻长短不等文字于像座、像背或龛侧,述兴造原由、时间、誓愿,并镌出资者姓名,是为造像记。

据造像记题名,参与其事者兼有无官爵之庶人、僧尼与官吏,绝大多数名不见史传,他们构成与史传中唱主角的帝王将相相对的民众。造像记出自北方各地,通过它们可以了解许多地区民众的情况。

兴福造像多半为民众自发组织,虽常有官员参与,却罕由官府操持,带有民间色彩。造像记把那一刻造像者部分内心世界刻画下来,所载是他们心愿的自由流露,看不到朝廷或僧团施加影响的痕迹。^[7]愿文主要是造像者为家人、己身及朋友知识等的祝愿,还有部分造像者进而为皇帝、国家、臣僚等祈福。后一部分内容体现了对皇帝、国家的态度,字里行间也透露出对皇帝与国家的理解。^[8]“国家”一词,古已有之,北朝民众也在使用。今日该词的含义主要出自近代西方,或指一个阶级压迫另一阶级之暴力工具;或指与公民相对的政府机构,目的是维持秩序、安全并增进公民的福利,拥有以武力作后盾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来实现其目的,它行使权力限于固定的地域,此领域内,国家拥有“主权”,即至高无上的权威,国家观念亦是抽象的、非人格的。^[9]关于中国古人头脑中的“国家”形

[6] 文中所论亦含少数城市居民,如云冈、龙门石窟之造像者,但主要为村落居民是不争的事实。

[7] 龙门石窟造像便足以证明这一点。该窟北临北魏都城洛阳,朝廷控制严密,窟内造像祈愿各异,不少显贵兴福只顾自家,未计朝廷社稷,如北海王元详、安定王元燮、广川王太妃侯氏等均如是。众多没有为皇帝祈愿的记文亦证明祈愿是自由的。

[8] 记文内容雷同者极少见,似不存在供套用的范本。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自由表达心愿。若可以,造像者所说即使选用某种流行的套话或范本,亦能反映其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认识。至于没有类似祈愿的造像者,也不能说不认同皇帝,对其一无所知,只是这种场合下不曾表现出来。

[9]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557页;并参《布莱克维尔政治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738页。

象,思想家们的见解尚可据其著作知其梗概,普通民众的看法似难弄清。过去研究农民战争时曾涉及农民思想中的“皇权主义”问题,讨论虽热烈,终因材料所限,语多泛泛^[10],裨益不大。北朝造像记中的有关内容,虽是片羽吉光,亦弥足珍贵,对认识这一问题或可提供些许帮助。

关于造像记中的皇帝、国家祈愿,日本学者佐藤智水与台湾学者卢建荣分别有所涉及。^[11]佐藤氏致力于探讨皇帝崇拜与造像题材的关系,试图从中找出理解北魏“国家佛教”的线索,对观念本身着墨不多。卢文提出不少富于启发性的问题,如有国家认同感的宗教团体居地与国家控制强弱的关系、造像者身份(如是否为官吏)与为国祈福的关系及其成因等,但亦没有专门考察国家观念,且所利用的造像记不多,材料运用与解释间有问题。另外,日本学者尾形勇曾对汉至唐的国家构成做了极有创造性研究,其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家族国家观”^[12],虽非专论国家观念,但不少见解颇具启发性。笔者希望在前贤的基础上再做些努力。

一 为国祈愿概观

民众造像如果将皇帝等列为造像对象或直接为他们发愿、求福,就表明民众心系国家,体现了对皇帝与朝廷的认同态度。具体分析前,先对有关记文的用语、结构略加交代。

依造像记,民众中使用的称呼有“国家”、“皇家”、“国王帝主”、“国主”、“帝主”、“皇帝”等。“国家”,如神龟二年(519)六月十日林师德造像云:“敬造弥勒像一区,上为国家四方安宁,下界洽(含)生之类,普同真口。”“皇家”,永平四年(511)九月一日比丘法兴造像:“敬造弥勒像一区,上为皇家、师僧、父母……”;“国王帝主”,如兴和二年(540)十二月□九日孙思宝等法义37人造像“敬造石像□躯,上为国王帝主,□僧父母……”;也有单用“国主”、“帝主”的,如大统十四年(548)四月三日介媚光造像:“上为国主、州郡令长、师僧父母……”,大统十七年(551)四月廿三日宗慈孙等37人造像称“仰为帝主永康,百僚长□”。^[13]更

[10] 有关文章如,宁可:《皇权主义》,《光明日报》1960年12月13日;孙祚民:《关于“农民政权”问题》,《中国农民战争问题论丛》,人民出版社,1982年,8—12页;谢天佑等:《中国农民战争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3页。

[11] 佐藤智水:《北朝造像铭考》,《史学杂志》第77卷第10期,1977年,28—35页;卢建荣:《从造像铭记论五六世纪北朝乡民社会意识》,《历史学报》第23期,1995年。

[12] 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1—42页。

[13] 诸记分见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以下简称《雕》),234页;《八琼室金石补正》(以下简称《琼》),卷13,第73页;《雕》258;《雕》292—293;《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以下简称《鲁》),第二函第三册,560页。

多的用“皇帝”或“皇帝陛下”，不赘引。记文表达形式多样，细分有如下几种：

一、明言造像对象是皇帝，祈愿中或有为皇帝祈福或无。景明四年（503）八月五日马振拜等34人造像说：“为皇帝造石像一区”，无具体祈愿。太和七年（483）追远寺众僧造像云：“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太子敬造千佛，愿缘此庆，福钟皇家，祚隆万代，普济众生”^[14]，则有具体祈愿。

二、造像直接对象非皇帝，而祈愿中含为皇帝的祝福，这类写法最常见。如天保十年（559）四月十八日王和等兄弟三人“为亡父母造多宝玉像一躯，上为皇帝陛下，中为七世先亡、师僧父母，下为含识受苦众生，利（离）苦得乐，愿共法界一时成佛，俱登妙果也”。这种书法中祈愿对象与祈愿的组合方式有两种，一是先列发愿对象，后书祈愿，上记是也；一是具体发愿对象与祈愿分别搭配，如建义元年（528）五月四日王僧欢造像云：“敬造尊像一躯，上愿皇祚永隆；历劫师僧、七世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女儿等及善友知识，边地众生，常生佛国，弥勒出世，龙华三会，愿登初首。”^[15]

三、不书造像对象，通过祈愿表达福报的领受者。兴和三年（541）正月廿三日曲阳京上村佛弟子乐零秀“敬造观世音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七世先忘（亡）、现在眷属，边地含生，等同福愿。”^[16]即是其例。

检笔者收集的1764种北朝纪年造像，含有上述用语及内容的凡533种。按时间及造像者身份，统计结果如下表。表2是表1中的数字与北朝纪年造像统计表^[17]中对应数字相除得出的百分比。

[14] 两记分见《琼》卷12,71页；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以下简称《图典》），446—447页。

[15] 诸记分见：杨伯达《埋もれた中国石佛の研究》（以下简称《石佛研究》），169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以下简称《拓》），第5册，84页；《琼》卷16,90页。

[16] 《石佛研究》，167页。

[17] 北朝纪年造像统计表：

身份 时间 \ A	平民 B	官吏 C	僧尼 A B	A C	B C	A B C	不详	小计
400—409	1							1
410—419	2							2
420—429	1							1
430—439	1							1
440—449	6	1						7
450—459	3							3
460—469	6	2	1				1	10
470—479	20	1	3					24
480—489	26	2	3		2		3	36

据表2,关心朝廷、皇帝的民众自440年代,即北魏初年便已出现,但尚不多见,至6世纪,即北魏宣武帝朝以后认同朝廷者渐多,所占比例亦达15%以上。北魏末,即520年代以后,比例增至24%以上,20年后,即东、西魏至北朝末则达30%—40%,关心朝廷的民众更多。大体上,北朝时期民众对朝廷的关心程度与日俱增。具体到不同背景的造像者,平民中存在这种趋势,官吏、僧尼中则无。不同背景的造像者相比较,官吏、僧尼比起平民来更关心皇帝的命运。多种身份造像者共同造像时关心国运者更多,这种情况下民众多以邑义、法义形式来组织,换言之,合邑造像时为国祈福者多,印证了佐藤智水的结论。^[18]

表1

平民 A	官吏 B	僧尼 C	AB	AC	BC	ABC	不详	小计
2								2
	1							1
1	2	1		1				5
1	1 [*]			1				3
3	5	2	1	4				15
7	4	6		2				19
21	7	7	3	10		1	1	50

续表

身份 时间\ 时间	平民 A	官吏 B	僧尼 C	A B	A C	B C	A B C	不详	小计
490—499	26	5	5		3			1	40
500—509	48	17	11	1	5			7	89
510—519	69	13	21		6	2		3	114
520—529	113	22	32	3	20		2	10	202
530—539	84	22	29	5	22	3	8	13	184
540—549	124	15	34	3	23	2	14	11	228
550—559	182	18	32	8	33	2	10	8	294
560—569	208	11	35	5	33	3	11	16	323
570—579	124	20	15	7	14	1	8	14	203
580	1		1						2
小计	1046	149	223	32	161	13	53	87	1764

本表所收造像记除《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附录所列1602种外,还包括了李静杰《定州系白石佛像内容总录》中提供的新资料。

[18] 佐藤智水前引文,32—33页。

续 表

平民 A	官吏 B	僧尼 C	AB	AC	BC	ABC	不详	小计
16	4	5	2	9	2	5	4	47
34	5	16	2	14		10	3	84
57	6	10	7	27	1	7	1	116
66	2	21	3	22	2	10	2	128
31	7	4	3	6	1	8	3	63
239	44	72	21	96	6	41	14	533

表 2 (%)

时间	平民 A	官吏 B	僧尼 C	AB	AC	BC	ABC	不详	小计
400—409									
410—419									
420—429									
430—439									
440—449	33.3								28.6
450—459									
460—469		50							10
470—479									
480—489	3.8	100	33.3		50				13.9
490—499	3.8	20		33.3					7.5
500—509	6.3	29.4	18.2	100	80				16.9
510—519	10.1	30.8	28.6		33.3				16.7
520—529	18.6	31.8	21.9	100	50		50	10	24.8
530—539	19.0	18.2	17.2	40	40.9	66.7	62.5	36.4	25.5
540—549	27.4	33.3	47	66.7	60.9		71.4	23.1	36.8
550—559	31.3	33.3	30.3	87.5	81.8	50	70	12.5	39.5
560—569	31.6	18.2	60	60	66.7	66.7	91	12.5	39.6
570—579	25	35	33.3	42.9	42.9	100	100	23.1	31.0
580									
小计	22.8	29.5	32.3	65.6	59.6	46.2	77.4	16.1	30.2

含有为皇帝祈福内容的造像分布今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辽宁等省的许多地区(下表3),显然关心皇帝的民众遍及北方各地。

表3

地点	造像记举例
河南洛阳	正光六年(524)十一月廿五日苏胡仁等造像
新乡	正光元年(520)十月廿五日合邑百人造像
辉县	正光五年(524)五月十五日杜文庆造像
滑县	兴和四年(542)十月八日李氏合邑造像
太康	武定七年(549)二月十五日普朗造像
汲县	天保十年(559)四月廿八日魏法兴造像
安阳	同年四月廿九日宝山寺僧造像
巩县	天统二年(566)七月十九日比丘明藏造像
偃师	武平七年(576)四月十五日杨安都造像
襄县	天保十年(559)八月廿五日张啖鬼等造像
登封	天保八年(557)十一月廿九日垣周等修塔像记
禹县	武定八年(550)二月八日杜文雍等造像
新郑	天保三年(552)三月刘子瑞造像
浚县	武平三年(572)□月八日佛时寺造像
山东历城	建义元年(528)五月四日王僧欢造像
博兴	武定五年(547)六月八日郭神通造像
诸城	天保三年(552)四月八日僧济本等造像
青岛	正光二年(521)六月五日伊□造像
昌邑	天保八年(557)三月廿二日法义造像
临淄	建义元年(528)六月十日道勇造像
益都	天保五年(554)七月十五日张景晖造像
无棣	天保九年(558)九月廿九日阳显姜造像
临沂	天保十年(559)三月廿六日成模生造像
济宁	天统二年(556)四月十日同邑卅人造像
青州	武平四年(573)九月十五日尼法绚造像
高青	武平五年(574)十一月廿三日高次造像

另见今河北之曲阳、东光、唐县、饶阳、武强、定州、藁城、南和、盐山、赵县及北京,山西之大同、闻喜、定襄、垣曲、寿阳、盂县、阳曲、平定、祁县,陕西之临潼、耀县、西安、洛川、黄陵、宝鸡、长武,辽宁义县及甘肃正宁等地,为免文繁,不具引例证。

民众居地距统治中心的远近与其关注皇帝、国家、为之祈福流行程度无关。卢建荣尝道及这一问题^[19],但他仅以二、三例为证,难以凭信。比较北魏洛阳龙门石窟造像与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的北朝造像,可更好地了解这一点。北魏后期洛阳一跃为帝都,成为全国政治中枢,龙门石窟北毗都城,东临伊水,通衢之侧,处统治严密之域自不待言。该窟造像也非置于家中,乃摩崖像,可供行人观礼。北魏结束前该窟有纪年造像 203 尊^[20],仅 19 尊含有国祈福之类内容,比例不足 10%。而河北曲阳,无论在北魏、东魏还是北齐时,距统治中心,无论是洛阳、邺城、晋阳或定州,直线距离近则 25 公里,远达四五百公里。该处发现的 45 尊北朝纪年造像多为小型像,应为家中供养之物,其中 16 尊含上述内容^[21],比例超过 35%。两相比照,相差悬殊,可证各地为国、皇帝祈福流行情况同造像者住地与帝国统治中心的远近无直接关系。

二 为国祈愿用语释意

统计只能概观北朝民众国家观念的流行情况,至于他们对皇帝的态度与认识,则需要具体考察记文的内容。民众所持的态度较简单,稍后再论,先从记文用语入手理清他们心目中的皇帝、朝廷,即其国家观念的具体内涵。

北朝民众已在使用“国家”一词,不过并不流行,533 种造像记中仅 20 种称“国家”。如正光六年(525)六月十日宣景建夫妻造像称“造弥勒像一区,为国家四方宁静”;西魏大统元年(535)七月八日比丘法胜“敬造玉像一区,上为国家师僧父母,普为法界”;北齐天保三年(552)十一月廿日杨哲“敬造释迦白玉像一区,上为国家、七世父母、己身、眷属、法界众生,愿俱尽苦原,同登正觉”^[22],等等。

民众所谓“国家”之含义是非人格化的政权机构还是掌国者?在汉代,特别是东汉,“国家”指帝室,也指皇帝个人,非指“公”的统治机构的总体。^[23]推敲记

[19] 卢建荣前引文,108 页。

[20] 据水野清一《龙门石窟の研究》(二)所附《造像编年》一统计而得,日本座右宝刊行会,1941 年。

[21] 据《石佛研究》165—172 页统计而得。

[22] 诸记分见《考古》1990 年第 2 期,172 页;《雕》,285,316 页。

[23] 参尾形勇前引书,244,243 页;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家”条,15 页。

文中“国家”出现的语境，参诸文献，答案应是后者。如上引杨哲造像，文中“国家”之外的祈愿对象均指人，且祈愿为“俱尽苦原，同登正觉”亦对人而言，“国家”指人是可以肯定的。又如兴和三年（541）十一月廿五日王丰始为亡息造像云：“上为国家、后为七世父母、居眷大小、亡过现存、边地众生，一时成佛。”既然希望国家也能成佛，所指当然是人了，类似的记文还见于天保元年（551）八月八日比丘智圆造像与武平二年（571）四月八日马祠伯夫妻造像。^[24]考诸文献，时人言语中亦以“国家”指皇帝^[25]，《魏书·崔浩传》浩言“今国家迁都于邺”、“国家当治邺”、“国家居广漠之地”，同书《张普惠传》载其上书：“国家缟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袭”，及《北齐书·清河王岳子勋传》勋语刘文殊：“王（指文殊）国家姻娅”，均是显例。至于记文中的“国家”指皇帝本人还是连同其家人，尚难判定。

多数民众胪列造像或祈愿对象时用的是“皇帝”或“皇帝陛下”，也有用“国主”、“帝主”、“国王”、“圣主”、“皇家”的。西魏大统十四年（548）七月廿一日杨标造像云“愿圣主祚昌万叶”，永平四年（511）九月一日比丘法兴造像云“敬造弥勒像一躯，上为皇家、师僧、父母、有识含生”云云。余者俱见前文，不赘。另有少数造像者不仅为皇帝，还兼为皇太后、中宫内外、皇太子一类的皇室成员求福。太和七年（483）八月卅日云冈邑义54人造像便是“上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等祈福，类似的造像还有同年的追远寺造像^[26]等17例。

上述称呼均指最高统治者本人或其家室，而非政权机构。民众头脑中的“皇帝”、“圣主”是泛指的象征符号，还是特指当朝天子，易言之，民众是仅为某个皇帝祈愿，还是无论何人南面称孤均坦然接受，为之祈愿？

综观诸记，情况并不一致。极少数事例中造像者特别拈出某个皇帝为之祈福，最受称颂的莫过于北魏孝文帝。龙门石窟中的景明四年（503）十二月一日比丘法生造像与杨大眼造像均说为孝文帝造，正始元年（504）正月七日法雅与宗那邑造像就对孝文帝歌功颂德，孝文帝之孙汝南王元悦修塔兴福亦不忘为乃祖追福。齐武平二年（571）十一月十三日胡后则为亡夫武成皇帝造像修福，又孝昌二年（526）七月一日上官信及子造像称“上为今上皇帝、东宫皇子，祈皇图永固”云云，明确注明为当朝之主求福。另有个别造像，造像者虽未确指为何帝祈愿，但强调希望他们所居的王朝久存于世，齐河清三年（564）四月尹景穆造像“仰为皇帝陛下，敬造斯福”，愿“齐祚与天地等寿”，天保十年（559）八月廿五日

[24] 三记分见《石佛研究》，166页；《考古》1980年第3期，245页；《鲁》第二函第四册，821页。

[25] 周一良上引书，15—16页。

[26] 四记分见《文物》1994年第7期，84—86页；《琼》卷13，73页；《拓》第3册，14页；《图典》，446—447页。